加藤周一将近世日本文学视作整个日本文学史的第三个转折期，其主要特征是：从武士到町人，各个阶层产生了自己的独特文化，且互相之间交流甚少。【日本文学史序说，304】

325:

18世纪以后，如这种才出现了许多职业的诗人。

【因而在此之前，汉诗的创作者以与官方有关联的儒者为主。】

326:

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前半叶，日本的造型美术达到了最高水平。有真正独创性的工作完成或开始。所谓的真正独创性，指的是艺术和宗教区分开来，完成了各个领域都走入世俗化。（328）

330:

茶会成为社会上层艺术交流的中心。聚集地是在京都。

德川时代中期以后，儒者知识阶层才形成。儒教成为了统一书画诗文的原理。

334:

雕刻木板技术推动了口传文艺向书写载体的转变。

这也是为什么和汉混合体在这一时期如此发达的原因。335

342:

德川政府设立了“廓”。结果就是：

这样,德川时代统治阶层同大众的文化开始分裂,在价值上的义理和人情,以及在行动上的表和里的双重结构,就在那里纠缠不休。转折期在十六世纪后半叶至十七世纪前半叶的百年间。所谓“元禄文化”的十七世纪后半叶,终于呈现出这切的结果。

——

1669 日本文学序说 下

《中朝事实》：将日本视作世界中心

16:

宋学的非形而上学化，也就是宋学的日本化。

20:

祖所发明的方法的特征,第一,不用向来的大部分日本儒者所作的那样变换语序训读(“和训环读”)汉语的本文,而用汉语直接读下来。和译不靠传统的训读,而是靠现代语(当时的)作自由的翻译(“愚老过去曾为初学者设想作学问之法, 最初让他们学长崎先生之学,教以中华之俗语,并用唐音通读之,翻译则使用日本近世的语言,而不逐字注和训,使之成为回读……”《祖俫先生诗文国字牍》)。

33:

新井白石的国语学和日本史著作。

实证主义的态度。

61:

町人所接触到的口诵文艺。

67:

诗人追求语言的完美。

而散文家和假名草子的作者则是用语言呈现自己对现实的观察。

69:

十八世纪：町人的时代

72:

第三种类型是“文人”。他们用中国语作文赋诗,擅长书画(文人画),与儒学,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无关。他们或是侍奉人,或是当浪人,但在精神方面,他们是从武士社会中独立出来并且也是从町人社会中独立出来的,他们彼此拥有强烈的伙伴意识。可以说,“文人”作为武家出身的知识分子集团,是在十八世纪前半叶才形成的。关于它的意义,容后详论。总之,这样的知识分子类型的分化现象,在武土社会及其周边发生了。

75:

在以中国的古典文化为典范这点上,“文人”的教养,与儒者的教养是一样的,成为武士统治阶层文化的一部分。

80:

要给“文人”下定义决非容易的事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的个性、教养和家族背景都大不相同。然而,给“文人”社会下定义则并不困难。为什么呢?因为在那里有具体的交友关系, 它与武士作为武士的、町人作为町人的交际的范围全然无关, “文人”对其社会的归属意识是非常强烈的。在那里,有伙伴们的赞赏、有固有的传说(如前面提到的《近世畸人传》是它的集大成)、有蔑视“市城名利之域”的共同态度,也至少有把他们的整个生活在作为“文人”的资格以图达到洗炼的美的共通价值观。这种事之所以可能,是因为一方面有柳泽淇园和木村兼葭堂的保护,另一方面有文化商品(画、俳谐、书籍等)需求的增大(教育的普及和购买力)的缘故。“文人”的伙伴,就是在社会周边成立的封闭的小集团,是一种以美的享乐主义作为其原理的。

81:

在他们的聚会和教养中,仪式化的倾向是明显的。仪式不是个人的发明,而是集团的规则。其仪式化的程度,应是显示个人被编入集团的程度吧。这就是说,具有同类型的教养、仪式化了的生活模式、共有集团内外区别的尖锐的意识伙伴们的聚会, 是“女房”社会和茶会以来的传统,而决不是从十八世纪“文人”社会开始的,实际上也不是以他们的情况而告终的。

91:

《自然真营道》和《统道真传》的文章,是以独特的训读为前提书写的“汉文”。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使中国语日本化而创作的一种日本语散文。他把自己的文章看作是为了说明哲学的必

96:

心学

石田梅岩

101:

他从这里出发,通过超越町人的立场及其特殊性的普遍的东西,试图使町人正统化。

103:

从根本上说,芭蕉的在其后(明治以后)的流行和“心学”的流行,也许可以说都是以同一个日本的土著世界观作为背景的。这是建立在现世主义、集团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实际的态度。如果它不被外国的知性的体系所覆盖的话,那么这样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,就会在日本历史的所有时期呈现到表面上来。从这个立场出发,抽象的“意识形态”的体系,只不过是根据需要可以利用的一种方便的装置而已。